

韓少功序跋之二

心學的長與短

孔見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有時甚至退避人後沉默寡言，對世事遠遠地打量與省察，活得像影子一樣不露形跡。但他筆下文字奇像競出，學涉東西，思接今古，一行行指向時空的寬闊和深遠，讓人不免有些驚奇。

從這些文字裡，可以看出他的學識蘊積，但他不願有冬烘學究的生吞活剝；可以看出他的文學修煉，但他無意於浪漫文士的善感多愁；可以看出他的現實關切，但他似乎力圖與世俗紅塵保持一定距離，不會在那裡一腳踏得很深；還可以看出他的精神苦鬥，但他大多時候保持一種低飛和近航的姿態，謹防自己在信仰或邏輯的幻境裡迷失，一再適時地從險域退出，最終停靠於安全而溫暖的日常家園。於是他的文字有一種親切和從容的風格，舉重若輕，化繁為簡，就像朋友之間的隨意聊天。即便有深義，有險句，也多藏於不動聲色之處，成為一種用心而不刻意的自然分泌，一種深思熟慮以後的淡定與平常。

孔見鎖定了一些高難度的人生逼問，把自己拋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戰場，關於生命的意義，關於知識的可能，關於道德與事功，關於幸福與死亡……這些逼問歷經數千年人類文明而仍無最終謎底示眾，於是在一個競相逐利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時代裡，如果沒有被人遺忘，就可能致人茫然或瘋魔。但孔見是一個披掛著現代經驗和現代知識的古老騎士，頑強地延續著人類對人生智慧極限的挑戰，也是對自己理解能力的挑戰。

在一般的知識譜系裡，這些懸問是虛學而非實學，屬於上帝而不屬於凱撒，在一個越來越務實的知識界那裡日漸處於邊緣位置，其正當性正在被經濟、社會、歷史等學科的諸多人士懷疑。但作者所遭遇的逼問人皆有之，在當下甚至人皆累之，正是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深刻運動的產物，本身就是實學不可忽略的部分。而離開了這一切心靈的牽掛，忽略了人類精神運行的坐標和軌跡，任何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的知識都只適用於機器人，無法描述活生生的生命實踐，沒有理由值得人們特別信任。孔子從“灑掃應對”通向他的治國安邦，是以人為本的；柏拉圖視人格為“內在政治制度（inner political system）”，從人格剖析開始他的社會設計，甚至是以心為本的——這些先賢在求知中內外並舉，虛實相濟，並不像某些後人想像的那樣幼稚。

當然，世上沒有抽象而普適的人，沒有抽象而普適的心，就像形形色色的病以外並沒有一種標準化的“病”。青年之我異於老年之我，富人之我異於窮人之我，連嬰兒也有遺傳差異，並無統一規格。如果剝離了具體人心形成過程中經濟、社會、歷史等方面的製約因素，尋求一種放之四海或放之萬世而皆準的“我”，只能是一種常見的語言事故——無非是“我”這個詞讓人真以為有了這樣一個東西，可以將其抽出來孤立地求解，可以將其供起來放心地依恃。

事實上，各歸其“我”的撫慰萬能亦無能，雖然用心向善，卻無助於揭示和排除任何人生疑難。有人已經這樣做過。他們才智過人心志遠大，於是求解生命終極之 being（所是，所在），求解一切知識的元知識，一切學科的元學科，如

同要謀得一個包治百病的藥方，結果呢，無不滑入迷宮般的 nonbeing（虛，虛無）。這一類語言事故發生在本質主義的思路，是虛學最容易落入的陷阱。他們如果沒有成為西方式的神學家，囿於一種專斷的虛無；就會成為中國式的玄學家，溺於一種圓通的虛無。而縱慾主義、實用主義、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等等並不能因此得到理性地克服，甚至恰恰成為這些神學和玄學的必然變體。原因很簡單，除非自殺，虛無是無法操作的——當心靈獨守虛無之際，一旦進入社會行為的操作，這份虛無就一無所用了，心靈就自動缺席和棄守了，讓位於世俗的隨波逐流乃至無所不為，是最可能的結局。

盛產神學的地方多見偏執和戰爭，盛產玄學的地方多見苟且和腐敗，這樣的例子還少嗎？

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提供的啟示。

因此，人心之學如果是必要的話，如果能夠更為成熟和堅實的話，應更善於在具體現實條件下展開問題和解決問題，更善於將經濟、社會、歷史等學科知識援入人生思辨，從而將終極關懷落實為現實方案，使天道真正實現於人間，所謂良醫“因病立方”和聖人“因事立言”是之謂也。出於特定的知識資源和個人喜好，孔見這些文章裡還殘留一些神學和玄學的傳統表述方式，頗有商榷餘地，但也不被我過於在意。他心事浩茫所針對的現實處境和現實對象，還有在切入這些處境和對象時相關的精神標尺，也許更值得我們會心地解讀。

2003年6月

（此文為孔見《赤貧的精神》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為語言招魂

學語言，其實是最簡易之事。一個人可能學不好數學，學不好哲學，學不好園藝或烹調，但只要沒有生理殘障，又有足夠的時間投入，再笨，也能跟著姥姥或鄰童學出流利的言語。即便是學外語，一般也不需要什麼特殊的天賦和才華，你把幾百個或幾千個小時砸進去，何愁不能換上一條純正的倫敦皇家之舌？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加速現代化建設，出現了舉國上下的英語熱。近兩億學生娃娃嘩啦啦大讀英語，熱得也許有點過了頭，在英語發展史上也算罕見的奇觀。但英語熱了多年，有些中國人一旦用英語，還是撓頭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沒八，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於是自覺愚笨無比——其實，這種自慚也過了頭。

英語難學至少有以下原因：

漢語以方塊字為書寫形式，是一種表意語言，與英語一類表音語言有天然區隔，在歷史上風馬牛不相及，長期絕緣，基質大異，各有固習和定規。比較而言，印歐語系雖然品種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語一分為多，有日爾曼語一分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著幾分相似的容顏，是大同小異或明異暗同。此後，英語在英倫三島上形成，作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產物，被丹

尼爾·笛福（Daniel Defoe）視為“羅馬/撒克遜/丹麥/諾曼人”的共同創造，

其中包括了日爾曼與拉丁兩大語流的別後重逢，可視為發生在歐洲邊地的遠親聯姻。由此不難理解，英語雖為混血之物，仍承續著印歐語系的自家血脈，與各個親緣語種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一位南歐或中歐人學習英語，或多或少仍有親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國人一眼望去舉目無親毫無依傍，沒有進入的憑藉。

另一方面，漢語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東亞，是十六世紀以後一個民族逐漸淪入虛弱時的語言，雖有一份恆定與單純，卻缺乏在全球擴張的機會。可以比較的是，英語憑藉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超級大國的兩代強勢，在長達近三百年的時段內，由水手、士兵、商人、傳教士、總督、跨國公司、好萊塢影片、BBC廣播、微軟電腦軟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蓋了和仍在覆蓋著世界上的遼闊版圖。在這一過程中，物種一經遺傳就難免變異，規模一旦龐大就可能瓦解。英語離開母土而遠走它鄉，實現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結果，竟是變得五花八門和各行其是。儘管“女王英語”通過廣播、字典、教科書等，仍在努力堅守標準和維繫破局，但不同自然條件、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形態的有力推動，使散佈在歐、美、澳、非、亞的各種英語變體，還是無可挽回地漸行漸遠。到最後，世界上不再有什麼標準英語，只有事實上“複數的英語”——包括作為母語和作為第二語的各式英語，包括貧困民族和貧困階層那裡各種半合法的“破英語”。高達五十萬的英語詞彙量，比漢字總量多出十幾倍，就是分裂化帶來的超大化，大得讓人絕望。一個英美奇才尚無望將其一網打盡，中國的學習者們又豈能沒有力不從心的沮喪？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語言之母，任何繞過相應生活經歷的語言學習必定事倍功半。當英語僅僅作為一門外語時，在學習者那裡常常只是紙上的符號，無法鏈接心中的往事，於是類似沒有愛情的一紙婚書，沒有歲月的一本日曆，庭院房屋已經消失的一個住址，沒有生命感覺的注入，不是活的語言。學習者們不一定知道，英語中所有尋常和反常的語言現象，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過都是歷史的自然遺痕。在過去的十幾個世紀裡，英語是先民游牧的語言，是海盜征戰的語言，是都市和市民階層頑強崛起的語言，是美洲殖民地裡勞動和戰爭的語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區混血家庭的語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語言，是資本主義技術精英在矽谷發動信息革命的機器語言……中國人置身於遙遠的農耕文明，沒有親歷這諸多故事，對英語自然少不了經驗障礙；如果對這一切又沒有足夠的知識追補，真正進入英語無異於緣木求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一切學習英語的人來說，眼前這本《英語的故事》十分重要。作者羅伯特·麥克拉姆（Robert McCrum）等人給學習者們提供了必要的補課。它拒絕語言學中的技術主義和工具主義，從語言中破譯生活，以生活來註解語言，用一種近似語言考古學的態度，將讀者引入歷史深處，其細心周到的考察，生動明快的筆觸，恢復了語言與生活的原生關係，重現了語言背後的生存處境和表達依據，使一個個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詞語起死回生。這是一本為詞典找回脈跳、體溫以及表情的書，是為語言學招魂的書。它甚至不僅僅是一本語言史，而是以英語為線索，檢索了英語所網結的全部生態史、生活史、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學領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當然包括了文學史——讀過此書之後，像我這樣的文學讀者，對莎士比亞、詹姆斯·喬伊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會有新的發現和理解，對一般

文學史裡的諸多疑團可能會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個中國全面開放的時代，一切對西方有興趣的讀者，一切知識必須涉外的學者、記者、商人、教師、官員以及政治家，都能從這本書中獲益，都能透過英語之鏡對西方文明獲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觀察。

本書的譯者歐陽昱，長期旅居英語國家，是一個詩人兼小說家，有漢語寫作和英語寫作的豐富經驗，在此書的翻譯中經常音意雙求，源流兼顧，形神並舉，有一些譯法上別開生面和饒有趣味的獨創，頗費了一番心血。個別詞語如“幣造”(coin 原意為幣，引伸意為生造或杜撰)，出於詞彙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雖不易被有些讀者接受，卻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為進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礎。

2004 年 2 月

(此文為歐陽昱譯著《英語的故事》序，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年。)

歸家的溫暖

當水泥和鋼材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能繁殖出彼此相似的高樓、道路、超市以及加油站，各種地貌特徵逐漸模糊和消失，我們的家鄉記憶還何以寄託？當一種物質化的個人主義態度，正逐漸割斷人與歷史的關係，人與群體的關係，使任何家園都被換算成開發和經營的數據，不過是計算器上一筆筆商業價值，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對家鄉保持特別的思念？在這種情況下，現代文明使我們富裕和強大，卻可能把我們從日常情理中連根拔起，在精神上無家可歸。

作為一個定居農耕民族，中國一直以家庭為價值基點——家族只是這一概念的延展，家鄉則是這一概念的再延展。葉落歸根，遊子悲鄉，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眾多有關家鄉的詞語都浸透了一種動人情感，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並不常見。比如那些從歐洲走向美洲、澳洲、非洲的億萬移民，習慣了馬背或航船，多少帶有喜遷樂遊的性格，目光總是投向前方而不是身後。其中有多少人能像中國人一樣常常惦記家鄉、歌頌家鄉、投資建設家鄉、乃至願意回遷和終老家鄉？老華僑們千里尋根的故事，我們能在其它國度聽到多少？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家鄉是鄉土、鄉親、鄉誼、鄉俗的生動舞台，也是秘藏情感記憶的一片重要礦脈。那一片祖居之地，總是使懷古追遠的意境油然而生。那一片生養之地，總是使和親睦鄰的氣氛撲面而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歷史感和群體感也許原產於斯，並且在世界文明交匯中，至今仍默默釋放出恆久而強大的磁吸能量。事實上，家鄉是一個人走向世界的入口，也是人們把握世界的坐標軸心。不可以想像，一個對過去缺乏關切的人，對未來能有多少擔當；一個對腳下這片土地冷漠的人，對遙遠異鄉的土地能有多少熱情——這個世界確有很多美麗豐饒之地，人們完全可以移居這個星球的任何地方，並沒有特別的理由定要固守熱土一隅；但一個沒有家鄉情懷的人，一個永遠在忙碌追逐而無暇回望的人，不管到了哪裡，大概都只有慾望的漂流，而缺失愛願的方位。

一個社會化和全球化的進程，正在使安土重遷不合時宜，家族裙帶和地方壁壘一類舊習也行將瓦解。中國人的定居農耕文明因其滯重和衰老，不得不接受浴火再生的陣痛，包括接受現代生活對家鄉這一概念的洗刷。但這一洗刷如果意味著家鄉的取消，意味著疲憊心靈對鄉土、鄉親、鄉誼、鄉俗不再感光 and 留影，事情則變得有些可疑。文明以人為本，不是以物為本，因此人的情感、人的審美、人的心靈皈依仍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作為一個靈敏測點，家鄉也許仍可繼續為我們測出文明的品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家鄉是現代文明反思的起點之一，因此它不是一個向後看的話題，而是一個向前看的話題；不是一曲懷舊者的輓歌，而是一個進取者的自我逼問。

由湖南省汨羅市文聯組織的這一次“汨羅美，家鄉美”徵文，歷時一年多，佳作迭出，華章滿目，是一次生動活潑的群眾文化活動，也是現代化進程之下眾多心靈甦醒之後的一次激情相聚。我有幸以汨羅為第二家鄉，又有幸閱讀了這次徵文的部分作品，再一次感受到了歸家的溫暖。

2004 年 8 月

（此文為湖南省汨羅市文聯徵文集《汨羅美，家鄉美》序，2004 年。）

重新生活

寫小說是重新生活的一種方式。

小說作者與其他人一樣，經歷著即用即廢的一次性生命。但小說作者與其他人又不一樣，可在紙上回頭再活一遍，讓時間停止和倒回，在記憶的任意一個落點讓日子重新啟動，於是年邁者重歷青春，孤獨者重歷友愛，智巧者重歷幼稚，消沉者重歷豪邁。

因為小說，過去的時光還可以提速或緩行，變成回憶者眼裡的匆匆掠過或留連往返；往日的身影和場景還可以微縮或放大，在回憶者心裡忽略不計或纖毫畢現。從這一點上來說，重新生活也是修改生活和再造生活，是回憶者們不甘於生命的一次性，不甘於人生草圖即人生定案的可惡規則，一心違抗命運的草草從事，力圖在生活結束後再造另一種可能，就像拿著已經用過的一張廢車票，在始發站再一次混進車廂里遠行。

捏著廢車票再一次獲准登車旅行，讓世界上所有的人生廢車票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多次生效——這就是小說寫作及其閱讀的特權。

收集在這本集子裡的，是筆者的一些中短篇小說，也是筆者在重新生活時不得不多看兩眼和多待一刻的驛地。這裡只有一些凡人小事，在這個浮囂的時代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如果筆者在這裡補上一些端詳或者一些遠眺，添入一些聆聽或者一些觸摸，作者的第二生命就已經上路。哪怕是一條隱沒在大山里的羊腸小路，也可能在這裡煥然一新和別有風光，其陌生氣息讓自己嚇一大跳。

小說於我有什麼特別重大的意義嗎？比方說小說能夠果腹和暖身嗎？能夠取代政治、經濟、法律、宗教、哲學以及新聞嗎？恐怕不能，恐怕很難。但小說至少能彌補過去的疏忽和盲目，或者說，至少能洞開一種新的過去，使我增收更

多惴惴於心的發現，增收一種更加有意義和有趣味的生活。我對此已感激不盡。如果讀者們能從中分享到一絲微笑或一聲嘆息，我更有理由感到心滿意足。

2005 年 3 月

（此文為《報告政府》自序，作家出版社，2005 年。）

行動者的啟示錄

從此就記住了這樣一個作者的名字：阿寶。

從此就知道身旁又多了一個這樣的人：在沉淪的時代奮進，在迷亂的時代清醒，在侏儒的時代做孤膽英雄。

事情發生在海峽對岸的群山之中，在一片累積霧珠、雲影、鳥音、落葉以及靜靜月光的山坡谷地。一位現代知識女性尋求環保農業的可能，歷時數載，獨身躬耕，披荊斬棘，摩頂放踵，只為了用一顆心靈來親證真理，使文明的價值變得可以觸摸和抓握，不再是高談闊論者的概念。

她帶回了一本科學的書。蟲鳥，草木，水土，建築，果農技術等等，在這裡都得到了細緻的檢驗和研究，不失為第一手的寶貴知識。其圖文配合的教科書樣式，更透出作者的認真、嚴謹以及耐心。如果我們要深度了解自然，完全可以把這本書帶在身邊，當作野外作業時小小的百科指南。

她帶回了一本文學的書。山野生活的細緻鏤刻，涉世感受的靈動速寫，一再受挫時的情節多變，山水放懷時的詩意凝沉，都使這本書成為充滿情趣的散文和小說，成為現代社會的牧歌。哪怕是書中一段議論體的穿插，其文字也大多挾風帶雨，明快甚至凌厲，不時迸濺出感覺的光點，讓我們一次次動心。

她帶回的這本書還是尖銳和熾熱的人文哲學。當現代化、全球化、市場化、資本化的洪流淹沒一切，環境問題既繃緊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更繃緊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正在出現深重的惡變。各種強勢話語致人昏昏，構成了危機本身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作者從繁榮中看到剝削，從發展中看到虧損，從優雅中看到殺戮，從科學中看到偏執和欺誑，甚至從貧弱者那裡看到了與權勢者同構相仿的心理倒影。她並沒有高調的精神潔癖。相反，正因為她投身最底層和最前沿的實踐，每一步都糾纏著自省下的道德兩難。也許，只有把自己逼入這樣的兩難，一個人才能真正體會出歷史的豐富與詭異，才能分辨出必要的代價和強加的代價，誠實的正義和虛誇的正義。

其實，她帶回的不是什麼書，而是無法用體裁和學科來分解的血肉生命，是一個知識遊俠成敗榮辱皆成文章的說了就乾。六年前，我移居中國南方一個山村，在那裡蓋了一棟房子，每年大約有半年時間在那裡種菜，養雞，植樹，結交農友，參與一些鄉村建設。在讀到這本《女農討山記》之後，我才知道此山遠非彼山，才知道世上還有更多猛士的背影足以令我欣喜，也令我慚愧，催我更加堅定和奮發。

無論在哪個時代，真理永遠只是“心身之學”而非“口舌之學”，無行之知不為

知也。這個時代不會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困難更多或困難更少。區別只在於，這個時代比以往時代更多一些真理的面具：論壇、著述、文憑、學銜以及項目的申報與評審，常常使求知者陷入暗中逐利的知識迷局。因此，求知之道在於言詞更在於行動，在於說法更在於活法，常常只以決於求知者能否收拾行囊走向實踐，能否走向充滿著塵土、汗水以及傷痛的長途。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是行動者的啟示錄。

2005 年 7 月

（此文為阿寶《女農討山錄》序，湖南文藝出版社，2005 年。）

“文革”為何結束

對於“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並上溯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乾脆把“文革”歸因於“權力鬥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迴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麼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於各地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日本軍國政府結束於外國軍隊的佔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誌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依託一場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成本很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其原因是什麼？如果說“權力鬥爭”和“全民發瘋”，那麼這一切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麼這些東西為何恰好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麼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於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於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換人（領袖去世等）的小變並不一定帶來改制的大變。即便是改制，也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甚至離不開某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七十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佈局建設，沒有以紅旗渠為代表的全國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種研發和推廣，縱有後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餘。那麼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後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像——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裡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1976 年以“四·五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1973 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籲民主，1974 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矛頭直指思想文化專制——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異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友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種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天安門事件並非孤立事件，其背後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色彩各異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為價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種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懷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投入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黨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種政治運動的信奉者與追隨者，習慣於服從權力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後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種沉重的問號湧上心頭。胡耀邦後來成為“民主”的黨內倡導者，周揚後來成為“人道主義”的黨內倡導者，顯然與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離型”，表現為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懷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慾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價值離心力。七十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後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錶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幹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聽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鬥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描寫的一夥軍乾子弟，也接近這種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慾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

“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徵，二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盪，使解放與禁錮都有異常的高峰表現。1966 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後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力鬥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後兩年裡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望塵莫及。他的政策進退失據，反復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迴盪著《國際歌》聲的“四·五運動”，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

“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於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 1968 年全國大亂被叫停後，異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與高漲，與五十年代末期“反右”後的萬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於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並不是對 BBC（英國廣播公司）或者 VOA（美國之音）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種根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異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種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所有造反不過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異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裡，民主從來沒有標準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崙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並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並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臘的民主制與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後人並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很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後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種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並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異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與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後，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像，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懷念著以前那種領導與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種“懷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種“後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後視鏡。

舊營壘的複位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機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於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 1967 年文）。這從反面洩露出一個事實：由黨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受到了重挫，但並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 1968 年到 1969 年全國恢復秩序之際，受到衝擊的黨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構成了實際性主體，並沒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 1972 年後，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復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機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得以倖存，是日後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二十世紀是“極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冷戰政治雙方都具有多疑、

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後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十五名軍區司令中的十三名，八十五名軍級幹部中的五十七名。六十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後共屠殺了近百萬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與穆斯林極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黨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二者共同構成了極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

不過，就大面積情況而言，混亂與血腥並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等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等地個別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彈壓——這一類故事並非不值一提。一大批精英恢復名譽（如陳毅等），或恢復權力（如鄧小平、萬里、胡耀邦等），也並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後。這些有別於蘇聯和印尼的現象，這種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復出，是受益於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於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這些問題對於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餘。

“要文鬥不要武鬥”，“團結幹部和群眾兩個 95%”，“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大體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二十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幾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於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後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後延。

從事後回憶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歷是“下放”——這包括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村、工廠、“五七幹校”參加學習和勞動。約兩千萬知青上山下鄉也是與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離散，專業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經歷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合理的怨恨，成為了他們日後投入抗爭的心理根源。可以想像，當這些人冤屈滿腔時，專案組的陰冷和大字報的專橫是他們的唯一視野。自己曾一度追隨潮流投身批鬥的壯志豪情，不一定能長存於他們的記憶。至於合作醫療、教育普及、文化下鄉、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等革命亮點，更難進入他們的興奮。這裡有回憶視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後人察覺。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數人遭遇遣返回鄉或拘捕入監，就標準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保留幹籍和黨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這在當事人後來的回憶錄中都有不經意的洩露，但不一定成為他們樂意講述的話題。對比《往事並不如煙》一書中受難者們忙著化妝、看戲、赴宴、吃西餐、坐享專車等“往事”，此時的厄運當然已經夠苦了，但這種“下放”畢竟還不太像嚴酷懲罰。在更大範圍裡，灰溜溜的大多數“下放”者仍然不失民眾的幾分尊敬、幾分羨慕、幾分巴結乃至嫉妒。他們仍然構成了潛在的社會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歷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

此調整社會階層結構，強迫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融合，嘗試革命化的“五七道路”——在一次已經失敗的民主大躍進以後，這無異於又來一次削尊抑貴的民粹大躍進，在世界史的範圍內同樣令人目瞪口呆。

與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對革命並無持久感恩的義務，倒是對極權的弊端日漸厭倦與不滿，物質和文化欲求也與禁慾化的強國路線尖銳衝突。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懷疑和抵觸現實的勇氣。“下放”所帶來的豐富經驗，更使他們在日後抗爭中富有生機活力。以文學為例：作家們在批判“文革”的文學解凍中，大多有“為民請命”的姿態，即便是個人化表達，也多與農民、工人、基層幹部心意共鳴，顯示出廣闊的人間關懷。即便這種關懷雜也個人情緒，但它至少把下層民眾始終當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懷念的對象，就像電影《牧馬人》表述的那樣。這與九十年代以後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自戀和冷漠，形成了明顯對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還是批判，但“下放”過程中所積蓄的思想情感一旦釋放完畢，有些精英興沖衝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臥房，回望門弟和權位，對“最後的貴族”一類話題津津樂道，甚至在報刊上製作出喜兒嫁大春是錯失致富良機的笑料——他們情不自禁地把社會等級制重建當作輝煌目標，與民眾的階層鴻溝正在形成。顯然，事情到了這一步，與“文革”後期那些與民眾緊密結盟的下放者相比，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變味、走形乃至南轅北轍？倘若他們所嚮往的階層鴻溝進一步擴大，倘若擺脫極權主義的鎖鏈，只是要讓社會大多數落入極金主義的囚籠，那麼民眾對革命乃至“文革”的懷念衝動會不會如期到來？

執政當局曾低估了民眾的不滿，低估了精英們屈從姿態後面的不滿，以歷史上罕見的“下放”運動加速了自己的失敗。當精英從民眾那裡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重現於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出爐成劍，形成了體制內的力量優勢，而且遍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種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復位，舊中有新。各種社會條件出現了複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1974年後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力不從心，到處受到陽奉陰違的抵制，已預示一個朦朧若現的結局。一旦時機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為號召，以“四·五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存制度資源和製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面的割據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黨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凡是派”儘管掌握了黨、政、軍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人的意志，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製”，是一種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與其說是製度，不如說更像是製度未成品，有時甚至不過是應急運動，是經驗的隨機把握。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但未能阻止“文革”的發生，最終還出現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餘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機後，如果還要繼續往前走，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面振興的歷史使命，就不得不面對製度建設和製度創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結語：不難理喻的“文革”

對“文革”的簡單化敘事積重難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國人被某些“傷痕”式作品洗腦後，說起中國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氣，搖頭瞪眼地驚嘆“不可理喻”。這恰好證明當今主流性“文革”敘事的失敗。理喻是什麼？理喻就是認識。我們需要自然科學，正是因為自然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自然現象解說得可以理喻。我們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正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人文社會現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們絕不可把“文革”越說越奇，越說越怪，越說越不可理喻，再把這個認識黑洞當作自己大獲成功的勳章。

“文革”是上十億大活人真實存在的十年，是各種事變都有特定條件和內在邏輯從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絕不是一堆荒唐的瘋人院病歷。只要不強加偏見，只要不扭曲記憶，一個貧窮大國急切發展中的多災多難，就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個交通事故更難於理解，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位親人或鄰居更難於體會——從根本上說，他們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這些活生生的人來參與和推動，並最終予以懷疑和終結的。今天，“文革”已結束三十年了，已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恰當距離了。我們需要更多作者來拓展和豐富對“文革”的敘事，還“文革”一個不難理喻的面貌。這樣做，可能會增加批判“文革”的難度，但只會使批判更加準確和有力，成為真正的批判。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和調整全局戰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種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制及其弊端，那麼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於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只意味著遷就於思維懶惰，意味著劃定學術禁區，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麼一種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必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十年中與極權關係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制和強國的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歷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種歷史上似曾相識的偏執論競賽並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誇張的紅色“懷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意識形態面前未戰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於不可理喻的狀態，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的半個世紀——“文革”就是從那裡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後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後續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後來各種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鏽鎖。

2005年7月

（此文為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

小說是“重工業”

自己寫過些小說，不免對這種體裁有些偏愛，總覺得小說既是文學體裁之一，又不失為文學的基礎產業，就像素描在美術中的地位，田徑在體育中的地位，重工業在工業中的地位。

這並不是說小說特別優越。其實，好小說往往有詩的品格，也往往有散文的手法自由和意態平實。甚至可以說，一個好小說家必是詩和散文的知音，總是善於從其他體裁那裡獲取營養，不斷從其他工種那裡得到啟發。我就曾在好幾次會議上，呼籲年輕的小說家向詩人跨界學習。

但營造人物與情節，講求敘事的精細和厚重，構成了小說與其他體裁美學公約數以後的剩餘，即小說不可取消的特點。那麼什麼是人物？人物就是生活的主體。什麼是情節？情節就是生活的過程。作為對人類生活的表現，文學如果失去了對生活主體與生活過程的近距離、多方位、高強度、大規模的形象產出，繞過了人物與情節這兩大要件，當然就有主要功能的缺失，怎麼說，也會留下致命的虛浮和殘損。

也許正因為這一點，自從紙張與印刷技術得到普及，小說在大多時候總是構成文學市場裡的主要產品，小說家一般來說也總是成為作家群體中的多數。只要翻一翻中外各種文學獲獎作品目錄，我們大概不難知道這一色彩斑斕的事實。有人說詩歌是文學的少年，散文是文學的老年，而小說自然就是文學的壯年了。從這個喻義上來說，一個人不可沒有青春期的激情，也不可沒有老成期的通達，但人世艱辛常常還靠年富力強的一輩來肩負——這也許就是小說不可推卸的文學中堅之責。

我所供職的海南作家協會，從一開始就破除舊體制，未設置專業作家崗位。作家們一律業餘化，下班以後再進入書房。這有利於作家們紮根社會生活，但對於小說（尤其是中、長篇小說）寫作這種時間和精力的高耗型作業，又可能造成了一些困難。這便是海南小說創作更需要支持的理由。始於九十年代的“海南作家叢書”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推出，先後出版了三十多本，就是以小說新作為主的，意在為小說家們提供更多園地。最近，“海岸文叢”一套十六本小說集，由海南省作家協會編選，在南海出版公司的再度支持下推出，也是為了進一步展示海南小說創作成果，為小說家們提供新的支撐和助力。

我相信，這裡的小說家們各有長短，各有精粗，但他們共同呈現出來的豐沃感受、獨特見識、靈巧技藝，將使讀者們獲得難忘的閱讀經驗，展示出海南文學遠航一片更為明麗和遼闊的水域。

我們為他們拉響致敬和送行的汽笛。

2005年8月

（此文為海南省小說創作叢書《海岸文叢》總序，海南出版公司，2005年。）

語言之外還有什麼

敬文東先生兼事小說與理論，在這本理論裡不免流露出小說家的餘興和積習，不時冒出比喻的嗜好、形容的衝動、戲說與大話的口吻，差不多上演了一出理論脫口秀，或是說書人嘴裡的章回哲學。

令人捏一把汗的是，這位說書人選擇了一個艱深得不能再艱深的話本，玄奧得不能再玄奧的回目——向“話語拜物教”發起挑戰。

自西方學界的“語言學轉向”以來，人們發現世界只能在語言中呈現，主流哲學因此幾成語言學，文本學，話語學。但大破諸多存在幻象之後，很多人也興沖沖一頭撲進了語言囚籠。他們的理由是：既然對不可言說的東西只能閉嘴，那麼文本之外一無所有，連假定的客觀真實也缺乏依據和毫無意義。這樣，在他們那裡，世界開始消失，鏡片而不是景物成了觀測對象，耳膜而不是聲音成了傾聽對象，傳統定義下的自在之物如果偶爾還被談及，卻已漸失人間氣息，漸失觸感和重量，眼看就要墜入虛無黑洞。

我理解敬文東此時的不安，包括他對某些同路人的敏銳生疑。在他看來，同樣不安的那些人雖然重提社會與歷史，擺出了一種針對話語崇拜的另類姿態，但他們的社會與歷史仍限於紙面敘事，只是一些符號和修辭的浮影，其反叛無異於窩裡鬥，體制內造反，以逆子之名行孝子之實——這種疑問同樣深得我心。

事實上，“窩裡鬥”本身就是社會與歷史的產物，也只有在社會與歷史的背景裡方可得到辨認。時值現代社會，一時間院校猛增，印刷機狂轉，書本知識爆炸，科層化與專業化一統天下，白領與藍領的社會鴻溝日深……這些活生生的現實事件，使大多文科僱員只能寄生於文本，呼吸於文本，想像歷史和社會於文本。對於這些文本生物而言，真要從文本的十面埋伏中殺出一條血路，談何容易！尤其是某些長期浸淫於西方邏各斯傳統的一根筋人士，若想一步跳出自己的肉身，談何容易！

話語崇拜教差不多就是校園產物，是文本過剩時代的產物，卻並非紙老虎一隻。需要自警的是，如果我們沒法找到非語言的認知通道，沒法找到超邏輯的實證坐標，沒法測出隱在文本縱深的實在之基，實在之根，實在之重力，那麼一不留神同樣會深陷話語迷陣，不一定比我們的對手走得更遠。

在這裡，敬文東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他盡力充分準備——這表現在他對各種理論資源，尤其是現代西學資源的廣泛涉獵和梳理。他盡力周到謀略——這表現在他在筆下穩打穩紮，瞻前顧後，細心佈局，重陣推進，哪怕在某些細節裡死纏爛打也在所不辭。他當然還有乾坤獨斷一往無前的氣概——這表現在他不吝讚許也不避挑剔，大膽學習也大膽懷疑，時時活躍著一個獨立的大腦，與各種學術經典平等過招，從嚴對練，即便在光環閃爍的前輩面前，也有六經註我的大志，決不心虛和腿軟。我匆匆讀完此書以後的感覺，是膽大後生竟一個人發動了淮海戰役或平津戰役，一心要面對人類的千年難題立言，要在存在論和認識論的神聖王國里再度立法，其志不可不贊，其創新的活力不可不奇。

在一百多年來西學東漸的單向運動格局裡，這種寬輻和深度的反思並不多見。至於他是否贏得了這場戰爭？或者說他斬獲了什麼又喪失了什麼？其裝備有何

優越又有何缺陷？其戰法有何成功又有何失誤？其攻勢在何處強勁有力又在何處虛弱不支？……這一切尚需行家們事後仔細評點，非此處一篇短序所能詳敘。作為友人之一，我從這本書裡得到很多啟發，也有不少問題需要向作者討教、商榷以及爭辯，只能留待日後饒舌。重要的是，提出問題就是解決問題的開始，著手行動才有贏得勝利的可能，敬文東已置身於知識危機的突圍前沿，已奮不顧身躍出掩體，投入了一次文本深處的求真之旅，一場重新為人類找回真知與真相的方法之爭、智識之爭、意義與價值之爭。

在我看來，面對一個人文知識界越來越無根化和空心化的時代，這一場意義深遠的世紀之戰無可迴避。

願有更多的志士前來關注和參與。

2006年8月

（此文為敬文東《隨貝格爾號出遊》序，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修訂的理由

我投入文學寫作已三十年。回顧身後這些零散足跡，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當年濃厚的理科興趣和自學成果，當一個工程師或醫生大概是順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運拋擲，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寫作這條路的。我自以為缺乏為文的秉賦，也不大相信文學的神力，拿起筆來不過是別無選擇，應運而為，不過是心存某種積鬱和隱痛，難捨某種長念和深願，便口無遮攔地不平則鳴。我把自己的觀察、經驗、想像、感覺與思考錄之以筆，以求叩問和接通他人的靈魂，卻常常覺得力不從心，有時候甚至不知這種紙上饒舌有何意義。人過中年的我，不時羨慕工程師或醫生的職業——如果以漫長三十年的光陰來架橋修路或救死扶傷，是否比當一個作家更有堅實的惠人之效？

我從事寫作、編輯、翻譯的這三十年，正是文學十分艱難和困惑的時期。一是數千年之未有的社會大變局，帶來了經濟、政治、倫理、習俗、思潮的廣泛震盪和深度裂變，失序甚至無名的現實狀況常常讓人無所適從。二是以電子技術和媒體市場為要點的文化大變局，粉碎了近千年來大體恆穩的傳統和常規，文學的內容、形式、功能、受眾、批評標準、傳播方式等各個環節，都捲入了可逆與不可逆的交織性多重變化，使一個寫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機、堅守和迂愚之間，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實現富有活力的選擇和反應。身逢其亂，我無法迴避這些變局，或者說應該慶幸自己遭遇了這樣的變局，就像一個水手總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風巨浪。

積累在這個文集裡的作品不過是記錄了自己在風浪中的一再掙扎，雖無甚可觀，卻也許可為後人審思，從中取得一些教訓。

精神的彼岸還很遙遠，在地平線之下的某個地方。我之所以還在寫下去，是因為不願放棄和背叛，還因為自己已無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佔發表總量的七成左右。藉此次結集出版機會，我對其中部分作品做出了修訂。

所涉及的情況，大致可分為三種：

一是恢復性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內地的出版審查尺度有一個逐步放寬的過程，作者自主權一開始並不是很充分。有些時候，特別是在文學解凍初期，有些報刊編輯出於某種顧忌，經常強求作者大刪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動手——還不包括版面不夠時的相機剪裁。這些作品發表時的七折八扣並非作者所願，在今天看來更屬歷史遺憾，理應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復。

二是解釋性的。中國現實生活的快速變化，帶來公共語境的頻繁更易。有些時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語，如“四類分子”“生產隊”“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現在已讓很多人費解。“大哥大”“的確涼”一類特定時期的俗稱，如繼續保留也會造成後人的閱讀障礙。為了方便代際溝通，我對某些過時用語給予了適當的變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釋性文字。

三是修補性的。翻看自己舊作，我少有滿意的時候，常有重寫一遍的衝動。但真要這樣做，精力與時間不允許，篡改歷史軌跡是否正當和必要，也是一個疑問。因此在此次修訂過程中，筆者大體保持舊作原貌，只是針對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適當修補。有時寫得順手，寫得興起，使個別舊作出現局部的較大變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據說俄國作家老托爾斯泰把《復活》重寫了好幾遍，變化出短、中、長篇的不同版本。中國作家不常下這種功夫，但如遇到去蕪存菁和補舊如新的良機，白白放過也許並不是一種對讀者負責的態度。

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熱情支持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謝文友東超、單正平等多次對拙作給予文字勘誤。還應感謝三十年來啟發、感動、支持過我的各位親人、師友以及廣大人民。

2007年7月

（此文為九卷本《韓少功系列作品集》總序，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

空談比無知更糟

這是一個精神病高發的時代，有關驚人數據一次次被刷新。究其原因，不僅可歸為人際冷漠、貧富分化、競爭過度等社會問題——就像眾多專家說的那樣；還可能是因為意見過於擁擠與紛亂。精神病就是心智亂。既然是“多元化”了，甚至“怎樣都行”了，那麼事情就開始變得麻煩。一個學生娃應該當個好孩子還是壞孩子，而且什麼是“好”，什麼叫“壞”，“好”要好到哪個分上，“壞”要壞到什麼程度……光是這些追問，就足以讓很多人頭大。

更遑論歷史、宗教、藝術、國家、革命等宏大議題，幾乎都是各說紛紜和各有其據的迷局。

傳統社會漸漸遠去，價值觀相對統一而穩定的時代從此不再，人們的惶惑迷茫數不勝數。一個活在當代的人，常把敬畏當愚蠢，視服從為醜聞，於是缺乏上帝或聖人的引領，耳朵裡又無時無刻不充塞著喧沸眾聲，比如被臉書、推特、微博、微信之類追逼得手忙腳亂。如果沒有能力消化分歧看法和對立觀念，就如同在狂飲暴食之際沒有一個好胃，最可能生病；又如海量文件接入電腦之時

沒有一個好 CPU，最可能死機——越來越多的精神事故，大概都爆發在“多元化”這一片雷區。

在這種情況下，讀書求知其實面臨著高風險，不會比原始部落裡的風險更少。為了降低這種風險，我們也許需要一點辯證方法，需要善解是中之非和非中之是，更準確地說，是看到什麼條件下“是”可以成“非”，而什麼條件下“非”可以為“是”。這樣，我們才能避免攥一把萬能標籤胡亂貼，而善於在知識迷局中去粗取精，趨利避害，總攬全局，統馭各方，不至於從“多元化”的狂歡滑入“虛無化”的泥沼。同樣是為了降低風險，讀書也許更需要實踐的檢驗與激活，需要我們從日常經驗和社會行動中汲取活力，恢復各種詞句的現實體溫，還原知識與人生的真切聯繫。這樣，我們才能從語詞的無限淹埋下殺出一條生路，把書讀活，讀通，讀踏實，讀出活生生的人，讀出人與生活的智慧，擺脫那種從書本到書本再到書本的泡沫化膨脹，不至於淪為空談化的“知道分子”。博聞廣識一旦變成了空談，其實比無知更糟。

韓國與中國，雖有製度與發展道路的差異，但兩國互為近鄰，共享傳統，也一同面對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的各種知識難題，無異於別後重逢的同桌學友，散後復聚的並肩旅伴，當然需要思想的分享，需要雙方知識界相互的幫助和支撐。感謝韓國青於藍出版社的熱心，感謝譯者白雲池的辛勞，感謝白永瑞先生的鼓勵和崔元植先生的推薦，初版於十多年前的拙作《閱讀的年輪》這次將在韓國面世，可望得到韓國讀者們的批評和指教，也使韓國讀者對鄰國的思想文化狀況略多一些了解。

因為這一點，我深感榮幸之至。

2008 年 2 月

（此文為韓文版《閱讀的年輪》自序，韓國青於藍出版社，2008 年。）

治學的道與理

本科畢業以後，覺得自己英文太爛，我經常騎著腳踏車回母校去外語系旁聽。其時謝少波先生正在那裡執教，給過我不少方便，還定期為我私下輔導，是一位難得的良師益友。我們在雜亂破舊的教工宿舍樓裡曾醉心於英文的詩歌與小說，共享湘江之濱一個文學夢。

稍感意外的是，他出國留學和工作以後，由文學而文化，由文化而歷史與社會，成為了一個視野日益廣闊的研究者和批評家，近年來更是活躍在國際學界，對一系列重大議題常有忠直發言，是全球性文化抗爭中的一名狙擊手和爆破手，一位挑戰各種意識形態主潮的思想義俠。

他出於“後現代”師門，操持現代西方的語言學、解構主義、文化研究一類利器，擅長一套西洋學院派戰法。但他以洋伐洋，入其內而出其外，以西學之長制西學之短，破解對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義，是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話語霸權。對“現代性”語義裂變的精察，對西方特殊性冒作“普適性”的明辨，對不同品格“人文主義”的清理，對“新啟蒙”與“新保守”暗中勾結的剖

示，對跨國資本以差異化掩蓋同質化的偵測……都無不是墨凝憂患，筆挾風雷，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思想殺傷力。

作為一位華裔學者，神州山河顯然仍是他關切所在，是他筆下不時綻現的襟懷與視野——這既給他提供了檢驗理論的參照，又有利於他拓展出一片創新理論的疆域。不難理解，他以多語種、多背景、多學科的雜交優勢，穿行於中西之間，往返於異同兩相，正在把更多的中國問題、中國經驗、中國文化資源帶入英語敘事，力圖使十三億人的千年變局獲得恰當的理論顯影，以消除西方學術盲區。

這當然是一項極有意義又極有難度的工作。想想看，一個沒有亞里士多德、基督教傳統、殖民遠征艦隊的中國，在內憂外患中驚醒，一頭撞入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迷陣，不能不經歷震痛和磨難——其難中之難，又莫過於陌生現實所需要的知識反應，莫過於循實求名。迄今為止的爭爭吵吵證明，中國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大的異數，最大的考題。無論是植根於歐美經驗的西學話語，還是植根於農耕古史的國學話語，作跨時空的橫移和豎移，恐都不足以描述當今中國，不足以診斷現實的疑難雜症。因此，援西入中也好，援中入西也好，都只是起點而非終點。像很多同道學人一樣，少波十分明白這一條。他有時候多面迎敵，一手敢下幾盤棋，不過是在雜交中合成，在合成中創新，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艱難孕育。

在本書的一篇文章裡，他談到莊子及其他中國先賢在理論中的“模糊性、歧義性、不確定性”。這涉及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也涉及知識生產的基本機制。其實，中國老百姓常說“道理”，“道”與“理”卻有大不同。道是模糊的，理是清晰的；道是理之體，理是道之用；若借孔子一言，道便是“上達”之物，理只是“下學”之物——下學而上達，方構成知識成長的完整過程（見《論語·憲問》）。可惜的是，很多學人仍囿於邏各斯主義舊習，重理而輕道，或以理代道。特別是在當前文本高產的時代，一批批概念和邏輯的高手，最可能是在話語征伐中陷入無謂的自得或苦惱。他們也許不明白，離開了價值觀的靈魂，離開了大眾實踐的活血，離開了對多樣和多變世界的總體把握，離開了對知識本身的適時信任和適時懷疑，在一些具體理法上圓說了如何？不能圓說又如何？在紙面上折騰得像樣瞭如何？折騰得不像樣又如何？

歷史上的各種流行偽學，其失誤常常不在於它們不能言之成“理”，而在於它們迷失了為學之“道”，在大關切、大方法、大方向上盲人瞎馬。比如作者在本書中談到的“他者”之說——在成為一個概念與邏輯的問題之前，它更像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吧？若無一種善待眾生的宏願，相關的細察、深思、靈感、積學等從何而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我敬重謝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不如說我更推崇他的為學之道；與其說我欣悅於他做了什麼，不如說我更欣悅於他為什麼會這樣做，為什麼能這樣做。

在一個大危機、大震盪、大重組日益逼近的當下，他也許做得了很多，也許做不了太多，這都並不要緊。但他與諸多同道共同發起的知識突圍，他們的正義追求和智能再解放，已經讓我聽到了希望的集結號，看到了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緩緩升起。

2008年8月

(此文為謝少波論文集《另類立場》中文版序，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歷史終究是生活史

從史實到史學，大體上是一個抽象和提純的過程，如同一個蘋果變成蘋果乾、蘋果汁、蘋果醬、蘋果粉乃至各種化學元素。這一過程的好處，是歷史變得便於保存（文字可防遺忘），便於攜帶（製成書籍或光碟），便於延時性品嚐（讓後人們理解與思考前事），但這樣做的風險在於蘋果園的風光不再。日後的讀書人一不小心，就可能以為當年蘋果樹上掛滿了化學方程式。

還原蘋果園的現場，是史學家們最大的野心，卻幾乎是不可能抵達的絕對彼岸。於是新歷史主義者如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就宣稱歷史如同文學，不過是一種敘事虛構。這當然有些誇張，至少無法得到考古學、文獻學、田野調查的足夠支持。但他們防偽打假的嚴厲態度，對蘋果乾、蘋果汁、蘋果粉、蘋果醬乃至各種化學元素的滿腹狐疑，也許不是一無是處。這至少讓人們明白，在史學與史實之間，在文字敘事與鮮活事實之間，還有一個還原現場的艱難任務。誰也沒有資格拍胸脯誇耀自己已一步跨入了真相。

我是一個寫小說和散文的，關注活生生的人間百態。出於這一習慣，在讀史的時候免不了在字裡行間心馳神往，常常依托今人以推想前事，想看清文字後面的人與生活，看清當年的環境、資源、細節、場景、工具、性格、心情、故事、習俗等等，不大滿足意識形態的邏輯圖譜。由此積下的若干點滴心得，當然微不足道，大概連遠眺蘋果園也算不上，一時不慎而誤入西瓜地或香蕉地也說不定。不過，這樣讀史至少比較有趣，眼前的一切會生動許多，會多一些形象、質感乃至氣味。高調一點地說，歷史終究是生活史，拒絕還原與有限還原還是不一樣的，還原不成功與壓根兒不打算還原也是不一樣的。

在此就教於各位方家。

2009年11月

(此文為繁體中文版《歷史現場》自序，香港三聯出版公司，2009年。)

詩的形式美

我不擅詩，但常被某些詩句震擊，最樂意向詩人鼓掌，有一次還花費自己整月的工資，買來一堆民間油印詩刊，在朋友圈廣為散發並為之大吹大擂。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自那以後，我大概仍算得上半個詩讀者，一般來說，既為不少詩壇新作而一再驚喜，也為某些詩作的泡沫化而漸生困惑：比如有些詩的情感造作（想必那傢伙只是衝著鏡子開發靈感），有些詩的意象枯澀（想必那傢伙正操一本詞典狂蒐奇詞怪語），有些詩人筆下語言的肥肥大大鬆鬆垮垮（比寫一張

借條或收條更不用心似的)——白話詩就是這樣一種口腔隨處排泄麼?

據說舊體詩容易束縛人的思想感情，當然是事實。為文造情或以辭害意的四言八句，乃至文言政策體、格律口號體，實為一大流弊。不過，把詩體革命理解為信口開河，理解為隨意分行的大白話，自由排列的詞彙表，放任無拘、恣意胡為、撿進籃子都是菜，則可能是受制於末流譯詩的誤導，出自於對西洋詩的誤解。事實上，把譯詩當作原詩很不靠譜。大多數西洋詩原作也是講求聲韻效果的，其精美處若未能呈現於譯作，只能賴譯者，或翻譯本身的局限。

文學畢竟是文學，不可缺少一種形式美——或者說是一種積蘊並融化在形式中的“潛內容”，即文化、歷史、哲學、道德之全部隱形信號，乃至心律、耳膜、血流、氣息、神經的生理所需。在這一方面，漢文學形式美源遠流長，其聲韻經驗至為豐饒和深厚。作為數千年來百煉千錘的美學遺產，且不說粘對、駢偶、詞曲制式，光是漢字四聲、五聲乃至九聲（如粵語）的聲調樂感，較之於拉丁語系與日爾曼語系的兩聲結構，就曾讓不少西洋人士驚羨。這有什麼不好呢？有什麼丟人嗎？莫非這些東西一度被誤用為枷鎖，就得被今人一古腦地棄之若蔽屣？其實，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寫小說、寫理論、寫新聞、寫公文、寫廣告或招牌，甚至一個民間草民開口說話，都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講求語感和語趣，包括詞句的品相與搭配，包括節奏與旋律的貼切，難道一個詩人寫詩，寫文學中的文學，倒是必須口腔隨處排泄？

因一次南方訪學的機會，與范曉燕久別重逢，談及以上感想，竟獲得她的讚同，讓我快慰與欣喜。據說她由此堅定了寫詩之志，更令我意外。她長期從事古典詩詞的研究和教學，又有現代詩詞寫作實踐，當然比我更有資格談詩。她的詩作既得古法，又多新意，自成一體，多彩多姿，一再用“新古代”和“舊現代”的文字幻境，把讀者引向電子世紀的煙波細雨，都市歲月的綠荷黃鸝，飄出超市或汽車的伊人裙裾，還有眼看就要投入開發或銷售的霞染江天……這些白話新詩，自由而輕快，字裡行間卻又不時閃灼出李清照式的纏繞，辛棄疾式的鏗鏘，常給人不知今夕何夕之疑。詩人呼吸著現代的炫麗、擁擠、忙碌、浮囂、富饒、厭倦、涼薄以及零亂、卻又深懷一個千年長夢，總是把想像託付給日月山川，凝定於春雨或落葉。這種瞬時與永恆的自我精神緊張，始終深隱於詩體形式的某種古今交集。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古典詩體美學的一種現代復活嗎？至少，不失為漢詩進化的寶貴探索之一吧？

范曉燕是我大學同學，雖在另一個班，其詩名卻早得我聞，一男生曾在課堂上以手抄詩示我，其中便有她不脛而走的少作。幾十年後，作為一個現代都市人，她仍能“詩意地棲居”於千年長夢，已足以值得人們尊敬和羨慕。

我應再一次鼓掌致敬。

2010年6月8日

（此文為范曉燕《風裳水珮》序，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回答一個世紀之問

歐洲進入工業化時人口不足一億；而眼下中國起碼相當於那時的十個歐洲。美國經濟起飛時每桶原油價格一美元左右，而當今中國正遭遇這個價格百倍以上的瘋漲。可以比較的懸殊條件遠不止於此。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極亂、極貧、極弱的爛中國，在辛亥革命後的一百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九十年，其經濟總量連續超越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直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不久前預測：中國將在五年（按 PPP 計算）或十五年（按 GDP 計算）後取代美國，實現經濟總量全球第一。

環顧全世界一百多個曾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同類國家，這樣的成功並不多見。其原因是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嗎？當然是。但答案不會這樣簡單。因為非洲早就有市場經濟，東歐早就放棄了“階級鬥爭”，拉丁美洲、南亞等早就開始與國際社會接軌，甚至全盤複製西方的宗教、政體、教育、文字以及土地私有製，但那裡並未出現全方位的持續快進，甚至很多國家至今仍困於飢餓與戰火。被譽為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1949 年尚比中國略富，2010 年卻是總量和人均 GDP 均隻及中國的四分之一——兩個人口大國應該說都有不錯的發展，但差距不幸被一再拉大。印度的腐敗指數，在西方有關機構的一再核查下也比中國難看許多。

這樣看來，對中國式成功的原因探索，須延展到市場經濟之外，須延伸到改革開放之前，即從“後三十年”延伸到“前三十年”，延伸到更為久遠的 1921 或 1911。歷史是一張無法剪碎的大網和一條無法割斷的長河。百年苦鬥之下國人的一系列成果，包括民族主權獨立這樣的政治遺產，包括“兩彈一星”、“全民掃盲”這樣的經濟和文化遺產，作為改革開放的基礎打造和條件依托，作為中國特色的另一剖面，不應排除在視野之外。同樣，百年苦鬥之下國人的諸多學費，包括慘痛的“大躍進”和“文革”，作為改革開放的教訓資源和校正依據，也不可諱言。這就像我一位朋友的比喻：一個人吃到第三個饅頭的時候感覺自己飽了，但問題是：如果沒有第一個、第二個饅頭，你那第三個饅頭的神力何在？

哪怕前兩個饅頭里夾雜了糟糠甚至泥沙。

可惜的是，近年來對歷史的虛無化乃至妖魔化，在某些人那裡幾成時尚。他們清算革命代價，指斥革命過程中的失誤、過錯以及假革命之名的罪惡，這都沒有錯，不失為總結經驗教訓的直言和善言。但如果這樣做，竟是一心讓中國換軌為菲律賓或烏干達的道路，有什麼智商可言？如果說革命的代價令人揪心，但革命前是否就沒代價？不革命是否就免代價？革命所針對的極亂、極貧、極弱，革命所終結的國土淪喪、軍閥混亂、餓殍遍地、流民如潮、欺男霸女、煙館娼樓、買辦資本獨大等等，豈不是人民更加難以承受的大禍？顯然，革命並不能許諾一個饅頭就吃飽肚子，更不能許諾一個饅頭就是天堂的門票，但革命是卑賤者最後的權利，是各種兩難選擇之下的迫不得已和特事特辦，是救國救民者的慷慨赴義和替天行道。少數後人置身局外的誇誇其談，其歷史“潔癖”如果不算幼稚，便是居心不端——他們無法接近中國革命的最大真相，也必然曲解當今時代的豐富內涵。

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瓊崖紅色記憶》，編選了一百多位作者回憶父輩革命史蹟的紀念性文章，重溫瓊崖革命鬥爭的艱難歷程和激情歲月，擴展歷史眼界，再現先烈的音容風貌，表達了新一代人崇高的時代禮讚，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要認識視角——當今中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從歷史深處一步步拼出

來、扛出來、磨出來、熬出來的，幾乎在每一寸土地都烙下了痛苦與犧牲。事實上，如果說這個千面中國難以琢磨，實為當今全球學界公認的一大謎團，那麼求解這一謎團的最初線索，也許要從很多年前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某個深夜開始，從很多年前一個兒子或母親離家遠行的某個拂曉開始，從很多年前一些普通男女淚流滿面或血濺五步的生死一刻開始。這本書樸素地講述一個個這樣的時刻；換句話說，是與長眠地下的千萬亡魂今夜重逢，共同回答一個世紀之問。

2011年5月

（此文為《瓊崖紅色記憶》序，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

想像一種批評

當代最好的文學，也許是批評——這當然是指廣義的批評，包括文學批評、文化批評、思想批評等各種文字。

這種揣測可能過於大膽。

如此揣測的理由，是因為電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已經告別信息稀缺的時代，進入了信息爆炸或信息過剩的時代。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拐點。在拐點之前，沒有網絡、電視、廣播以及發達的報業，文學家是生活情狀的主要報告人；文學作品享受著“物以稀為貴”的價值優勢，更以其具象化、深度化、個性化的特質，成為效率最高和廣受歡迎的信息工具，幫助人們認識世界與人生。但在拐點之後，如果不是對文學鑑賞有特別的訓練與愛好，通過波德萊爾去了解法國，通過托爾斯泰去了解俄國，通過魯迅和沈從文去了解中國人，對於一般大眾來說已很不夠用，至少是不太方便。現在的情況是：細節與敘事不再是文學的專利，段子、微博、博客、視頻、報刊、電視劇等都充滿細節並爭相敘事。每天揣著手機和敲擊鼠標的很多人，不是信息太少，恰恰是苦於信息太多、太繁、太亂，以至自己的大腦形同不設防的喧囂廣場，甚至是巨大的信息垃圾桶，常處於茫然無緒和無所適從的狀態；就好像一個人不餓了，而是暴飲暴食之際需要一個好胃，來消化鋪天蓋地的信息淹沒。

文學當然還能繼續提供信息增量，而且以其具象化、深度化、個性化的看家本領，成為全球信息產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廣大受眾更迫切、更重要、更廣泛的需求，似乎不再是這個世界再增加幾本小說或詩歌，而是獲得一種消化信息的能力，關係到信息真偽的辨別，信息關係的梳理，信息內涵的破譯和讀解——這不正是批評要做的事情？即使就文學本身而言，當文學日益接近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虛腫，一種富有活力的批評，一種凝聚著智慧和美的監測機制，難道不是必要的自救解藥？

把批評總是視為文學的寄生物，既不聰明也不公正。體裁本身並無高下之分。從唐詩到宋詞，從宋詞到元曲，從元曲到明清小說……文學從來不會消亡，但會出現演變，包括體裁高峰形態的位移。那麼，在一個正被天量信息產能深刻變革的文化生態裡，批評為什麼不可能成為新的增長點、新的精神前沿、以及

最有可能作為的創新空間？批評——那種呼啦啦釋放出足夠智慧與美的批評，那種內容與形式上都面目一新的批評，為什麼不能在一個信息過剩的時代應運而生，成為今天無韻的唐詩和宋詞？

對於未來，我們需要一點勇敢甚至猖狂的想像。

我不是批評家，充其量只是一個批評寫作的學習者。收入這個集子的部分文章，與其說是與讀者對話，不如說首先是與自己對話，是幫助自己消化繁雜信息的一點嘗試，以協調感性與理性、實踐與書本，防止消化不良之後的病入膏肓。感謝陳光興、彭明偉等台灣同行的幫助，讓這本文集與台灣讀者們見面。我知道，海峽兩岸多年來受制於不同的社會形態、歷史軌跡、文化實踐，展開對話並不容易。雙方依據不同的語境，因事立言，因病立方，會形成不同的興趣重點、知識性格以及言語習慣。但同為中華文化的傳薪者，大家共同努力於批評的寫作和閱讀，因應當下這個萬花筒似的文化大變局，以繼續精神的發育成長，也許不失為與時俱進之舉。

歡迎指教。

2011 年 5 月

（此文為繁體中文版《韓少功隨筆集》序，台灣社會科學雜誌社，2011 年。）

鏡頭夠不著的地方

影視產品擠壓紙媒讀物是當下一個明顯趨勢，正推動文化生態的劇烈演變。前者傳播快，受眾廣，聲色並茂，還原如真，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諸多優越，不能不使寫作者們疑惑：文學是否已成為夕陽？

沒錯，如果文字只是用來記錄實情、實景、實物、實事，這樣的文學確實已遭遇強大對手，落入螳臂擋車之勢，出局似乎是遲早的事。不過，再想一想就會發現，文學從不限於實錄，並非某種分鏡頭腳本。優秀的文學實外有虛，實中寓虛，虛實相濟，虛實相生，常有鏡頭夠不著的地方。錢鍾書先生早就說過：任何比喻都是畫不出來的（大意）。說少年被“愛神之箭”射中，你怎麼畫？畫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臟？同樣的道理，今人同樣可以質疑：說戀愛者在“放電”，你怎麼畫？畫一堆變壓器、線圈、插頭？

畫不出來，就是拍攝不出來，就是意識的非圖景化。其實，不僅比喻，文學中任何精彩的修辭，任何超現實的個人感覺，表現於節奏、色彩、韻味、品相的相機把握，引導出缺略、跳躍、拼接、置換的變化多端，使一棵樹也可能有上千種表達，總是令拍攝者為難，沒法用鏡頭來精確地追蹤。在另一方面，文字的感覺化之外還有文字的思辨化。錢先生未提到的是：人是高智能動物，對事物總是有智性理解，有抽象認知，有歸納、演繹、辨證、玄思等各種精神高蹈。所謂“白馬非馬”，具體的白馬或黑馬或可入圖，抽象的“馬”卻不可入圖；即便拿出一個萬馬圖，但“動物”“生命”“物質”“有”等更高等級的相關概念，精神遠行的諸多妙門，還是很難圖示和圖解，只能交付文字來管理。若沒有文字，腦子裡僅剩一堆亂糟糟的影像，人類的意識活動豈不會滑入幼兒

化、動物化、白痴化？屏幕前“沙發土豆（couch potato）”式的惡嘲，指涉那種聲像垃圾桶一般的大腦，越來越奇葩的大齡卡通一族，豈不會一語成讖？一條是文字的感覺承擔，一條是文字的思辨負載，均是影視鏡頭所短。有了這兩條，寫作者大可放下心來，即便撞上屏幕上的聲色爆炸，漢語寫作的堅守、發展、實驗也並非多餘。恰恰相反，文字與圖像互為基因，互為隱形推手。一種強旺的文學成長，在這個意義上倒是優質影視生產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我從事文字寫作多年，眼高手低，乏善可陳。感謝四川文藝出版社熱情關注，以漢語實驗為選材角度，以文體變革為謀劃焦點，在二零一一年有關台灣版本的基礎上，推出這一套三卷集，並藉用我多年前的一句話：“想得清楚的寫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寫成小說”，以作散文與小說的各自題示。這種編輯思想和編輯手法，在我看來都別具一格，其復興漢語寫作的大志也令人欣慰。至於實際效益，則有待讀者檢驗了。

2012年1月

（此文為三卷本《韓少功漢語探索讀本》序，四川文藝出版社，2012年。）

我是一群同名者

眼前這一套作品選集署上了“韓少功”的名字，但相當一部分在我看來已頗為陌生。它們的長短得失令我迷惑。它們來自怎樣的寫作過程也讓我有幾分茫然。一個問題是：如果它們確實是我所寫，那我現在就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如果我眼下堅持自己的姓名權，那麼這一部分則似乎來自他人筆下。

我們很難給自己改名，就像不容易消除父母賜予的胎記。這樣，我們與自己的過去有異有同，有時像是一個人，有時則如共享同一姓名的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他們組成了同名者俱樂部，經常陷入喋喋不休的內部爭議，互不認賬，互不服輸。

我們身上的細胞一直在迅速地分裂和更換。我們心中不斷蛻變的自我也面目各異，在不同的生存處境中投入一次次精神上的轉世和分身。時間的不可逆性，使我們不可能回到從前，複製以前那個不無陌生的同名者。時間的不可逆性，同樣使我們不可能駐守現在，一定會在將來的某個時刻，再次變成某個不無陌生的同名者，並且對今天之我投來好奇的目光。

在這一過程中，此我非我，彼他非他，一個人其實是隱秘的群體。沒有葬禮的死亡不斷發生，沒有分娩的誕生經常進行。我們在不經意的匆匆忙碌之中，一再隱身於新的面孔，或是很多人一再隱身於我的面孔。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作者署名幾乎都是一種越權冒領。一位難忘的故人，一次揪心的遭遇，一種知識的啟迪，一個時代翻天覆地的巨變，作為自我改變的深度介入力量，其實都是這套選集的眾多作者。

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鼓勵我編選這一套作品，對三十多年來的寫作有一個粗略盤點，讓我有機會與眾多自我別後相逢，也有機會說一聲感謝：感謝一個隱身的巨大群體授權於我在這裡出面署名。

2012年5月

（此文為十卷本《韓少功系列作品》序，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

前世今生長樂鎮

四十多年前，我初中畢業後下鄉務農，落戶汨羅縣天井公社，位於長樂的西南邊。我與農友們挑運竹木薪炭一類常常路經這個古鎮，對這裡的甜酒、麻石街、臨江舊廟等印像很深，總覺得這一切必有神秘來歷。十多年前，我應朋友之邀，築廬於汨羅市八景鄉，就在長樂的東北方，與古鎮僅有一山之隔。平日里要購買液化氣，辦理郵政事務，置辦一些日常用品，如此等等都需要我驅車入鎮，混跡於熙熙攘攘的客流中，近距離見證這裡日新月異的現代演變。這樣，我雖無長樂戶籍，但幾十年來與長樂頻頻相遇，人生軌跡幾乎繞著這個古鎮轉了大半個圈，不能不說是一種緣分。

長樂，樂其天樂其道長其人也。我在文學作品中曾多次提到這一地名，但局限於遊人看客的零星印象，缺乏深入查考，有時候記憶夾雜想像，不免寫得閃閃爍爍。在這些時候，我特別希望有一本關於長樂的工具書，能準確而周詳地發掘人文史料，為我們揭示出古鎮前世今生的全面真相，也讓外人進一步認識長樂有所方便。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書眼下終於誕生了。

這幾乎是一個搶救性的工程。感謝周明劍、餘耀宗、陳太初、游泳、李望姿、王友槐、劉澤龍、魯育民等各位熱心人的辛苦工件，眼前的這本書對長樂的建制沿革、族源、宗教、建築、語言、藝文、民俗、傳說等做了近乎百科全書式的展示，既有歷史的縱深，又有文明的廣角，既有“田野調查”式的大規模采風實錄（如歌謠部分等），又有頗具專業水準的高精度治學解疑（如方言部分等），因此無論就體量還是品質而言，都達到了令人驚喜的高度，可謂筆路藍縷，集腋成裘，功德無量。考慮到這本書的編撰和出版完全是一種“民間行為”，參與者們的家園情懷和文化自覺，更是讓人感動。

長樂是湖南省眾多古鎮之一，是全國遼闊土地萬千家園裡偏僻的一角。在中國進一步城鎮化的現代熱潮之下，古鎮還在繼續發育成長。建設一個經濟強鎮、環境美鎮、文化雅鎮、平安福鎮的重大挑戰，還需長樂各界人士心力與物力的巨大投入，需要管理者的責任擔當和智慧謀劃。毫無疑問，作為一本地方精神史，《湖南省長樂鎮文化》不失傳薪之功，將幫助古鎮人民傳承歷史，開創未來，積養內涵，打造形象，贏得一個更加輝煌未來。我相信這也是本書所有參與者的熱切願望。

2013年1月

（此文為周明劍等主編《湖南省長樂古鎮文化》序，中國發展出版社，2013年。）

思想史的偵探者

偵探小說常被歸類為俗文學，大多配以花哨或陰森的封面，堆放在流行讀物攤位，吸引市井閒人的眼球，被他們心驚肉跳卻也沒心沒肺地讀過即扔。如果有人要把思想理論寫成偵探小說，如同一個經學院要辦成夜總會，一個便利店要出售航天器，在很多讀書人看來純屬胡鬧。

本書作者劉禾卻偏偏這樣做了。在我的閱讀經驗裡，她是第一個這樣做的。

這本書的結構主線，是考證納博科夫（Nabokov）小說中一個叫“奈思畢特”（NESBIT）的人物原型，因此全書看上去仍是文學研究，西方學界常見的文本細讀和資料深究，教授們通常乾的那種累活。不過，作者的驚人之處，是放棄論文體，換上散文體；淡化學科性，強化現場感；隱藏了大量概念與邏輯，釋放出情節懸念、人物形象、生活氛圍、物質細節……一種偵探小說的戲仿體就這樣橫裡殺出，冠以《幽影劍橋》或《魂跡英倫》的書名都似無不可。這也許不是什麼學術噱頭。用作者的話來說：“（文本分析）不是普通的閱讀，而是智力遊戲，和下棋、推理小說和數學的博弈論差不多，這些領域之間既隔又不隔。”“任何人只要獲得文本分析的訣竅，運用起來則放四海而皆準，適用於歷史、法律、經濟、文學以及任何需要詮釋的生活對象，為什麼？因為文本分析是思想的偵探儀，而思想和罪犯一樣，無孔不入，無處不在。”

顯然，作者對拆字法的興趣並非動筆主因。她對歷史人物的知人論世和語境還原，對生活暗層和時代深處幽微形蹟的細心勘驗，對權力和利益在相關語詞後如何隱匿、流竄、整容、變節、串謀、作案的專業敏感，如此等等，與柯南·道

爾的業務確實相去不遠。去偽存真，見微知著，很多學者要辦的不就是這種思想史上的大案要案？不就是要緝拿文明假相後的意識形態真兇？因此，一部思想史論潛入偵探故事，其法相近，其道相通，兩者之間並無太大的文體區隔。

“奈思畢特”幾乎是一個隱身人。據傳記作品《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透露：

巴特勒，一個保守黨政客，曾任英聯邦副首相，就是奈思畢特面具後面的那一個。傳說納博科夫自己就有過這樣的指認。但本書作者很快找出一系列重大疑點，證明這一指認很不靠譜，頗像納博科夫的文字遊戲再次得手，偽造現場後脫身走人。

從這一些疑點開始，飛機一次次騰空而起，作者混入熙熙攘攘的旅行客流，其偵探足跡遍及英國、法國、瑞士等諸多歷史現場，尋訪證人，調閱證詞，比對證物，一大批涉案者隨後漸次浮出水面。作者看來也不無驚訝，這個以“牛（津）（劍）橋故事”為核心的關聯圈裡，竟有地位顯赫的科學家貝爾納、李約瑟、沃丁頓、布雷赫特、霍爾丹等，有人文界名流普利斯特利、里爾克、奧威爾、艾略特、海耶克、徐志摩、蕭乾、尼卡（納博科夫的表弟）等，幾乎構成了二十世紀初一份可觀的知識界名人錄，一大堆彼此獨立又相互交集的人生故事，由一個神秘的 NESBIT 從中串結成網。有意思的是，這些人一旦走出聲名和地位的世俗光環，都有政治面容真切顯影，後人無法視而不見。在那個資本主義如日初升的年代，全球知識界似乎初遇現代性裂變。無論是英國皇家學會院

士（如貝爾納、李約瑟、魏丁頓等），還是諾貝爾獎得主（如布雷赫特等），這些大牌科學家清一色左傾，“劍橋幫”幾成紅色老營，被英美情報機構嚴防死打。這是一個疑問。人文界的情況要複雜一些。普里斯特利、里爾克等走左線；奧威爾、尼卡等向右轉；艾略特不太左卻惡評《動物農場》；納博科夫相當右但又與同門諸公格格不入。當畢加索忽悠“四維空間”藝術時尚時，似乎只有徐志摩這樣的窮國小資，才對西洋景兩眼放光，小清新萌態可掬，未入住劍橋也未在劍橋正式註冊卻寫出了一大堆劍橋戀曲，其文學觀卻七零八落，跟風多變，能對齊主流輿論便行。這又是一連串可供思考的疑問。

一幅五光十色的知識界眾生相，一種幾被今人遺忘的政治生態圖譜，較之於百年後全球性的理想退潮和目標迷失，較之於當下階級、國家、文明、種族、性別的衝突交織如麻，能給我們什麼啟示？作為一部獻給中國讀者的重要備忘錄，作者在這裡以小案帶出大案，從小題目開出大視野，終於走向政治思想史的世紀追問和全球審視，重拾前人足跡，直指世道人心，再一次力圖對人格、價值觀、社會理想給予急切喚醒。

因大量採用敘事手法，作者輕裝上陣，信筆點染，靈活進退，以一種東張西望處處留心的姿態，布下了不少傳統文論所定義的“閒筆”。其實閒筆不閒。劍橋高桌晚餐時男士們一件件刻板的黑袍，與默克製藥公司職員談及任何專業研究時的吞吞吐吐，看似兩不相干，如聯繫起來看，倒是拼合出當代西方社會的某個重要特徵：既有宗教的頑強延伸，又有商業化的全面高壓。當年波斯米亞風氣之下的裸泳和開放婚姻，與美國校園裡“光身漢”吃官司與獄中自殺，看似也是些邊角餘料，開心小橋段，如稍加組合與比對，卻也輕輕勾勒出西方文化的差異和流變。更可能讓中國讀者感慨的是：當年有僕人給學生們一一上門送飯的奢華劍橋，仍讓出身於俄國貴族的納博科夫難以忍受，當然是比他錦衣玉食的魏拉公館寒酸太多；而中國明星學者梁啟超只能蝸居巴黎遠郊，差一點被凍死，成天須靠運動取暖；他的同胞北島，一個瘦削和憂鬱的流亡詩人，近百年後仍只能靜守北歐冰天雪地的長夜，“一個人獨自對著鏡子說中文”……在這裡，表面上平等而優雅的文明對話後面，書生們最喜歡在書本中編排的國際名流大派對後面，有多少利益、財富、資源的佔有等級早已森然就位，有多少當事人困於階級和民族生存背景的深刻斷裂——看似細微末節的這一切，難道不也在悄悄說破重大的歷史奧秘？

由此說來，閒筆也是主旨，敘事也是論說。由氛圍、形象、故事組成的感覺傳達同時也是理性推進，更準確地說，是對理性的及時養護與全面激活。很長一段時間來，理論是有關蘋果的公式而不是蘋果，更遠離生長蘋果的水土環境和生態條件，於是很容易淪為概念繁殖概念，邏輯衍生邏輯，一些公式纏繞公式的封閉性遊戲。但文科理論的有效性在於解釋生活，解釋人與社會，不在於其它。如果我們不僅需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哪些說法，還要知道這些說法是何人所說，在何種處境中所說，因何種目的和機緣所說，從而真正明白這些說法的意涵和指涉，那麼就不能不把目光越過說法，抵近觀察當事人的活法，去看清構成某種活法的相關氛圍、形象、故事——也許，一種夾敘夾議的文體，理性與感性兩條腿走路的方法，或可為這種觀察提供便利。

形式從來都是內容的。本書作者的文體選擇，與一種還原語境與激活歷史的治學思路，看來是寫作的一體兩面。

據她所述，偵破之旅一開始並不順利。第一次叩門劍橋的英國海外聖經公會檔案部就吃了閉門羹。因一封聯繫信函石沉大海，反復解釋和懇求最終無效，冷

冷的管理員不給她任何機會：

“對不起，沒有事先預約，就不能進檔案館。”

她只能絕望地離開。

讀到這裡時，我覺得這一小事故如同隱喻。我們都沒拿到幽靈的回執，永不會有歷史彼岸的邀請，只能在黑暗中與自己相約，奔赴永無終點的求知長旅。

2013 年 8 月

（此文為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公司，2014 年。）

序韓氏家譜

自工商活躍交通便捷，眾生遷徙日繁，族群與故園不復重合，唯姓氏如薪火永續，承血緣標識，載歷史思憶。

以姓氏領結家譜，生物專家或疑其遺傳網絡有漏，啟蒙高士或疑其父權主線有偏，然盡孝行悌乃人類精神之底蘊，慎終追遠為中華文明之深基，其漏其偏，不掩家譜之善，於上敬祖、於下睦親，感卹眾生，德澤社會，不失為民間之樸風良俗也。

韓門一係可上溯周代姬姓，自始祖萬受封於韓地，遂為韓氏百代之啟。先祖韓光於明代嘉靖年間（公元 1522 年），自鄂荊遷湘澧，迄今繁衍十數代，可謂根深葉茂，豐沃千里。歷世同祖胞親生生不息，華路藍蕓，披荊斬棘，修身齊家，濟民報國，於農於工於文於武百業有成，或娶或嫁或守或遷八方歸譽，歷祖若知，當欣慰於九泉；眾裔如聞，必振奮於來日。炎黃大家庭煌煌史冊，自有我門英才卓士豐功偉績輝耀其間。

誠謝宗親韓紹祖、韓顯峰等急公好義之士，不辭勞頓奔波南北，不避繁雜輯校今古，遍集零落以求不遺，精理目序以保不紊，終得韓氏家譜續編凡百萬字，以為我族人尋根思源之憑，感恩懷德之依，增益親情厚積鄉誼之據，功莫大焉。謹以為序。

2013 年 11 月

（此文為湖南省澧縣韓氏新編族譜序，2013 年。）

直面其心

一平是我知青時代的朋友，兩人務農之地相近，後又分別供職於縣里兩部門，

僅一牆之隔。他天資聰穎，書法、美術、文學、聲樂、象棋、籃球、乒乓球等無師自通，上手即高手，友人無不驚羨。但聰明人的風險是什麼都玩得轉於是什麼都玩，時間一長也就成了廣譜藥丸和游擊大俠，能遍地開花，專業識別度卻稍顯模糊。

術業專攻其實也有風險。古人曾說“內美”與“修能”。專攻者勤學苦練一大堆知識和技法，實質上是傳承前人經驗，對接文化成習，以求作品接受面最大化。但舊識易壅蔽心靈，匠技易淹沒情志，一旦入而不出，“修能”便傷其“內美”。這裡有內外兼修的兩難。太多從藝者一輩子克隆前賢，高仿古法，更像是一些業務興隆的複制專家。

從藝術史的譜系看，一平遠離宋元，趨近明清，重意而輕於形，求道而慎於術。用他自己的話說：“道高於術，道法自然。”“藝術中的法非永恆不變，先有法，後有變法，最後無法生萬法。”其實他對於明清前輩也僅取其神，並不願亦步亦趨。因此，他的書、畫、印皆無法無天膽大妄為天馬行空，很難納入任何批評程式的框架——包括明清文人寫意傳統那一路。

換句話說，與其說這裡是一些可供觀賞和解析的作品，勿寧說更像作者心境的隨機成像，一個人內心密碼的紛紛裸示。與其說觀眾可讀他的手，可讀他的腦，勿寧說更須直面其心。

比較能給我感覺的作品有：《回家》的飄忽步履必定是指向草廬之門。《渭城朝雨》恍如石匠字和鐵匠字，是勞動號子一聲聲砸出來的。《焉能摧眉》充滿民間野性，恰似怒髮衝冠拍案而起大出一口惡氣。《知行合一》有桀驁不馴睥睨天下的雄強。《楚風尋我》形如披頭散發上天入地的楚徒。《出入平安》都給人一種緊張感，布下某種易爆的危機氣氛。《酒》《隨意》《兩幅潑寫的字》像神魔並出，大鬧天下，馳騁萬里。《佛魔一念間》《生生不息》等初看如胸透膠片，或噩夢截屏，黑壓壓的致人驚駭，但一種渾身是膽金剛怒目式的威猛盡出其中。《阿哥阿妹在深山》的親暱嬌憨實在太可愛了。《毛古斯》隱藏了小屁孩頑皮搗蛋的勁頭。《我》和《虎壽》分明是笑出來的字，與《樂》和《心如月性似風》那些醉出來的字相映成趣，都有老夫聊發少年狂之樂。《開心》是跳動和踴躍，相當於管弦鑼鼓交織的歡騰。《悠悠寸草心》無異於乖孩子想家，小眼睛眨巴眨巴，襁褓之夢忽在目前。《天涯比鄰》的寥落感和孤獨感讓人惻然不已。《逝》是一曲幽幽通向遠方的陽關三疊。《自強求缺》有一種儉樸、低調、清高的隱形標高。《守正出奇》掩不住淡定、慎獨、大巧若拙、外圓內方的悄悄自許。《蔔素樸素》放達而飄逸，寵辱兩忘，目無今古，禪定不為，差不多是一聲聲雲外鶴鳴。《無窮》《給弟弟路平的酒字》等則有親切的點染，柔情的流淌，陽光的潑灑，空闊而靜寂的逝者如斯，一瞬即萬世的時空凝固……

這些視覺造型有的樸拙，有的狂放，有的萌態可掬，有的仙氣回環，還有些意蘊亦虛亦實，忽近忽遠，才上眉頭又上心頭，我也難以尋找和捕捉。合上畫冊，一聲唏噓，一平還有多少胸中塊壘需要在紙上燃燒與迸放？

藝術是寂寞的，“無法生萬法”的藝術家更有寂寞長途，與齊聲鼓掌萬眾歡呼市場天價注定無緣。他想必對此已有所準備。

我與他見面不多，聯絡也疏，遙想當年鄉下的雨夜對床已恍若隔世。好了，謝謝他一冊《莫非》抵達，讓我有機會重返當年，在想像中點燃一盞油燈，聽他在雨聲中把自己此生娓娓道來。

2013 年 11 月

（此文為劉一平書畫印集《莫非》序，湖南美術出版社，2014 年。）

大自然因人而異

四十多年前，紅衛兵退出中國“文革”舞台，都市中學生絕大部分都被動員上山下鄉，去窮鄉僻壤摸爬滾打，接觸土地、農民、社會底層傳統。我是他們中的一員。沒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後因緣再續，我避開都市的諸多應酬和會議，與妻子回到當年務農之地，蓋了一個房子，在那裡種菜植樹，抗旱排澇，晴耕雨讀，一晃又是十五個年頭。

準確地說，是十五個半年——因每年秋收後我們都返城越冬，處理若干家務和公務，也讓自己能保持左看城右看鄉的不同視角。

與都市不同，鄉村景觀要恆定得多，其山脊線和溪流聲越過千年甚至萬年，幾無時間痕跡。於是這裡的明月、野渡、鮮花、飛鳥、竹籬、樵夫等，早已成為文學中的陳詞濫調，小資筆下的心靈脂粉和美文味精，與當地居民卻沒有太大關係。一些令雅士們驚豔的紅葉，其實是脫水或失溫的表徵，想必是樹木備受折磨之態，不一定值得讚美。一些時尚男女所賞玩的流螢，其實意味著蟲害迫近，把菜園、瓜園、果園送入危機時刻，足以讓某個農夫焦灼。作為現代生產力的龐然怪物，一條水泥公路割去了往日的馬幫和獨木橋，常被旅遊者覺得大煞風景，但由此帶來的物流暢通，包括鋼材、水泥、塑料、玻璃、電器的進村入戶，倒可能讓山民們歡天喜地。

由此看來，所謂“自然”因人而異，因文化和財富而異。鄉村不僅僅是風景畫，不僅僅有浪漫主義消費的保留節目，還有自然中的人。這些人五花八門，其各不相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生老病死、喜怒哀樂、沉浮福禍的平凡故事，同樣是自然的一部分。這些人不是隱居兩年的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以《瓦爾登湖》著稱），更不是帶上旅行裝備去咬咬牙狠心待上三兩週的仿梭羅，而是在這裡搭上了一輩子。因此，他們的形跡構成了對自然更直接、更深入、更可靠、更活化、更具有歷史感和生命感的詮釋，潛入人類骨血中深藏不露。若離開了他們，目光越過了他們，任何人筆下的自然都有幾分可疑，也許不過是盆景的放大，恆溫花房的延展，幾首田園詩的現場模擬再現，甚至是某些霸權者施展文化劫持和生態剝削的偽自然——恰恰表現了他們對自然的嚴重誤解。當事人無論如何激動或深情，與這一片天地裡眾多他者的真相其實仍相去甚遠。

2013 年冬，我應邀在台灣講學一月，有機會遊歷這裡的美麗山河，有機會與不少農民、志工、有關專家交流鄉村建設的經驗，交流某種走近自然的體會。感謝台灣人間出版社的熱情相約，這一本《山南水北》增修版能在海峽對岸面世，算是我與這些朋友交流的繼續。

我相信還有更多別樣的自然有待我們前去認識。

2014 年 3 月

(本文為繁體中文版《山南水北》序，台灣人間出版社，2014年。)

螢火蟲的故事

在作家群體裡混上這些年，不是我的本意。

我考中學時的語文成績很爛，不過初一那年就自學到初三數學，翻破了好幾本蘇聯版的趣味數學書。“文革”後全國恢復大學招生考試前，我一天一本，砍瓜切菜一般，靠自學乾掉了全部高中課程，而且進考場幾乎拿了個滿分（當時文理兩科採用同一種數學試卷）——閒得無聊，又把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題也輕鬆拿下，大有一種逞能炫技的輕狂。

我毫不懷疑自己未來的科學生涯。就像一些朋友那樣，一直懷抱工程師或發明家之夢，甚至曾為中國的衛星上天懊喪不已——這樣的好事，怎麼就讓別人搶在先？

黑板報、油印報、快板詞、小演唱、地方戲……捲入這些底層語文活動，純粹是因為自己在“文革”中被拋入鄉村，眼睜睜看著全國大學統統關閉，數理化知識一無所用。這種情況下，文學是命運對我的撫慰，也是留給我意外的謀生手段——至少能在縣文化館培訓班裡混個三進兩出，吃幾頓油水稍多的飯。可惜我底子太差，成天撓頭抓腮，好不容易才在一位同學那裡明白“論點”與“論據”是怎麼回事，在一位鄉村教師那裡明白詞組的“偏正”關係如何不同於“聯合”關係。如果沒有民間流傳的那些“黑書”，我也不可能如夢初醒，知道世界上還有契訶夫和海明威，還有托爾斯泰和雨果，還有那些有趣的文學呵文學，可陪伴我度過油燈下的鄉村長夜。

後來我終於有機會進入大學，在校園裡連獲全國獎項的成功來得猝不及防。現在看來，那些寫作確屬營養不良。在眼下寫作新人中閉上雙眼隨便拎出一兩個，大概都可比當年的我寫得更鬆弛、更活潑、更圓熟。問題是當時很少有人去寫，留下了一個空蕩蕩的文壇。國人們大多還心有餘悸，還習慣於集體噤聲，習慣於文學裡的恭順媚權，習慣於小說裡的男女都不戀愛、老百姓都不喊累、老財主總是在放火下毒、各條戰線永遠是“一路歡歌一路笑”……那時節文學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才華。一個孩子只要冒失一點，指出皇帝沒穿衣服，便可成為驚天動地的社會意見領袖。同情就是文學，誠實就是文學，勇敢就是文學。宋代陸放翁說“功夫在詩外”，其實文學在那時所獲得的社會承認和歷史定位，原因也肯定在文學之外——就像特定棋局可使一個小卒勝過車馬炮。

解凍和復甦的“新時期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很像五四新文化大潮時隔多年後的重續，也是歐洲啟蒙主義運動在東土的延時補課，慢了一兩拍而已。雙方情況並不太一樣：歐洲人的主要針對點是神權加貴族，中國人的主要針對點是官權加宗法；歐洲人有域外殖民的補損工具，中國人卻有民族危亡的雪上加霜……但社會轉型的大震盪和大痛感似曾相識，要自由，要平等、要科學、要民富國強的心態大面積重合，足以使西方老師們那裡幾乎每個標點符號，都很對中國學子的胃口。毫無疑問，那是一個全球性的“大時代”——從歐洲十七世紀到中國十九世紀（史稱“啟蒙時代”），人們以“現代化”為目標的社會變革大破

大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識“範式”（科學史家 TS Kuhn 語），而是創建全新知識範式，因此都釋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義文學，重新定義生活。李鴻章所說“三千餘年一大變局”當然就是這個意思。歷史上，也許除了公元前古印度、古中國、古伊朗、古希臘等地幾乎不約而同的文明大爆炸（史稱“軸心時代”），還鮮有哪個時代表現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程度。

不過，“軸心”和“啟蒙”都可遇難求，大時代並非歷史常態，並非一個永無終期的節日。一旦社會改造動力減弱，一旦世界前景藍圖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旦技術革新、思想發明、經濟發展、社會演變、民意要求等因緣條件缺三少四，還缺乏新的足夠積累，沉悶而漫長的“小時代”也許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國產電影正是這樣自我指認的。在很多人看來，既然金錢已君臨天下，大局已定，大勢難違，眼下也就只能幹幹這些了：言情、殭屍，武俠，宮鬥，奇幻，小清新，下半身，機甲鬥士……還有“壞孩子”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蕩蕩的文壇早已變得擁擠不堪，但很多時尚文字無非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齡遊戲和文化玩具，以一種個人主義寫作策略，讓受眾在心智上無須長大，永遠拒絕長大，進入既幸福又無奈的自我催眠，遠離那些“思想”和“價值觀”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或小姦大萌，再勾兌點憂傷感，作為小資們最為嚴肅也最為現實的表達，作為他們的華麗理想，閃過了經典庫藏中常見的較真和追問，正營銷一種抽離社會與歷史的個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味著總是有錢花，但不必問錢來自哪裡，也不必問哪些人因此沒錢花。中產階級的都市家庭，通常為這種勝利大“抽離”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廣闊的受眾需求空間。

文學還能做什麼？文學還應該做什麼？一位朋友告訴我，“詩人”眼下已成為罵人的字眼：“你全家都是詩人！”……這說法不無誇張，玩笑中卻也透出了幾分冷冷的現實。在太多文字產品傾銷中，詩性的光輝，靈魂的光輝，正日漸微弱黯淡甚至經常成為票房和點擊率的毒藥。

坦白地說，一個人生命有限，不一定遇上大時代。同樣坦白地說，“大時代”也許從來都是從“小時代”裡滋生而來，兩者其實很難分割。抱怨自己生不逢時，不過是懶漢們最標準和最空洞的套話。文學並不是專為節日和盛典準備的，文學在很多時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若無人，需要繁瑣甚至乏味的一針一線。哪怕下一輪偉大節日還在遠方，哪怕物質化和利益化的“小時代”鬧騰正在現實中咄咄逼人，哪怕我一直抱以敬意的作家正淪為落伍的手藝人或孤獨的守靈人……那又怎麼樣？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鄉村看到的一幕：當太陽還隱伏在地平線以下，螢火蟲也能發光，劃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線，其微光正因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導人們溫暖的回憶和嚮往。

當不了太陽的人，當一隻螢火蟲也許恰逢其時。

換句話說，本身發不出太多光和熱的傢伙，趁新一輪太陽還未東昇的這個大好時機，做一些點點滴滴豈不是躬逢其幸？

這樣也很好。

2014 年 11 月

（此文為《韓少功讀本》序，載《今天》雜誌 2014 年冬季號。）

從內心開始

唐代韓愈在《答李翊書》中曾指出寫作的兩個目標：一是“立言”，二是“勝於人”。在他看來，前一目目標比後一目目標更重要。

這一區別顯然是相對而言。

我這裡想補上第三個目標，或者說第三種狀態：不得不寫。這是指五味雜成的感受鬱積於懷，不吐不快，非說出來不可。這樣的寫作不一定能爭勝，更不一定能立言，甚至一開始就不過是自說自話，私事私辦，不大考慮市場需求和公共評價，只求對自己做一個交代。換句話說，這種文字更像是寫給自己，差不多是棄權於成功與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釋放和解脫。

《山南水北》和《日夜書》大概就是這一類作品。這兩本書追蹤自己在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包括各種隱秘的焦慮、驚訝、憂傷、喜悅、屈辱、感懷，雖也有假託和虛構混跡其中，親歷性的現場記憶卻是主要敘事動力。歲月流逝，數十年一晃就過去了。彈指之際，千年變局。天地之間，惟心是歸。當熠熠閃光的那麼多人和物正變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漸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豈是多餘？當真理多元化幾成常態，一個文本消費的時代裡眾聲喧沸，那麼多一點針對自己的檢索和詰難，是否比提高聲調拉開架勢說服他人更為迫切？就這樣，放下技法，放下風格，放下創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風險規避，一切從內心開始，便成了一件輕鬆的事。

或者說，文學在很多時候本該是一件簡單的事，就像呼吸，就像漫步和入夢，無須太多高難動作的拼比。

承蒙友人不棄——感謝劉錦琳先生策劃，何立偉先生配畫，安徽文藝出版社繼《馬橋詞典》等四卷之後再次誠邀合作，使這一套精裝配圖叢書逐漸成形。藉此機會，《山南水北》在2006年作家出版社初版的基礎上略有修補，《日夜書》在201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再版的基礎上略有增刪。特予說明。

2015年1月

（此文為精裝插圖版《日夜書》和《山南水北》總序，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

經典：加法與減法

文學經典是一個彈性概念，通常是指那些影響長存的作品，在文學史上具有典範、指標、基石的意義。

其實，這些作品大多留有知識精英的物權印痕，切合歷史上中（產）等階級的總體心理需求——因為只有讀書人才可能掌控評說、課堂、圖書館、文學史，以及向公眾傳導文學信號的職能。這樣說的意思是，草民對民間迷信插得上手，對文學卻不大夠得著。權貴對公文插得上手，對文學也不大夠得著。因

此，經過一段不太長的歲月，迷信與公文不知何處去，很多文學作品卻依賴眾多讀書人的齊心合力，仍能頑強地保值增值，一次次重返書架。

讀書人五花八門，並非統一的整體。有的白皮膚，有的黑皮膚；有的信基督，有的歸佛門；有的敢擔當，有的頗頹廢；有的傍權貴，有的走江湖……於是產生不同的文學標尺，也是常情。但不管他們之間差別多大，既然都讀書，既然都在書裡泡，就如同一群棋友對棋藝還是會形成大致相近的規則。這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其“經典性”也許跨不出政治紅區的邊界；《阿凡提的故事》的“經典性”不一定能在基督教地區有效；但《羅密歐與朱麗葉》《西廂記》《紅樓夢》之類就不一樣了。這些讀書人共有的美人夢、精英悶騷、憤世糾結，能引起更廣泛和更持久的共鳴，成為興奮的更大公約數。

這印證了一種後現代主義的說法：凡經典都是建構之物，有一個經典化的過程，常常取決於什麼人、為了什麼、憑藉什麼來上下其手。

不過，這並非事實的全部。地攤上那些花哨的暢銷讀物能不能成為經典？那麼多涉性、涉金、涉官、涉暴的文字，明明撓到了很多人的癢癢肉，不脛而走，呼風喚雨，為什麼就很難碰上什麼“經典化”的好運氣？可見，建構並非無條件的，無法由知識話語權一類來隨心所欲。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筆下，葡萄酒是法蘭西人建構出來的一種文化圖騰，沒那麼天經地義。這也許沒錯。但法蘭西人再任性，再有能耐，也沒法把陰溝水建構成什麼至尊國寶。這裡的區別在於：與陰溝水不同，葡萄酒具備了基礎條件，具備了候補圖騰的可能性，在營養、口感、氣味、色澤等方面顯示出無可替代的價值優勢。這就是後現代主義者不應忘記的另一半真相：思想與藝術終究是文學的硬道理。

天不變道亦不變，道不變文亦不變。只要人還沒有變成機器人，只要這個最大的“天（自然）”還沒變，那麼某種普遍的人性之道，或說人類較為廣泛和持久的價值共約，就會構成“經典化”的隱秘門檻，把泡沫和垃圾逐漸淘汰。托爾斯泰作為一個“思想大戶”（切入宗教、道德、政治的時代焦點），喬伊斯作為一個“藝術大戶”（竟然發現、開發、釋放出意識流這等奇物），就這樣跨入了門檻。還有一些“資源大戶”，比如《西遊記》（佛教文化資源）、《聊齋誌異》（道教文化資源）、《三國演義》（帝王文化資源）、《水滸傳》（江湖文化資源）等，也是各得先機，各成氣象，成為不易繞過去的大塊頭——至少在中國是如此。相比之下，大仲馬、張恨水一類超級寫手，再熱鬧也還是嫌“輕”似“小”，在大指標上的辨識度較低，最可能就被建構者們的目光跳過去。

不難看出，“經典化”誠然是一個動態過程，卻是一種有限界的分佈函數。換句話說，“建構”是文化權重者們做的加法；而淘汰和遺忘則取決於天下人心，是更多人在更久歲月和更大範圍操作的減法，一種力度更大的減法。

前者有偶然性；後者有必然性。

換句話說，前者是運之所成，靠機緣；後者則是命之所限，靠實力和品質。在這個意義上，大部分文學史其實皆可半信半疑，因為任何一個文學作品，都是在這種加法與減法的雙向對沖之下，進入一種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無限漂泊，至少需等待下一本甚至N本文學史的再度檢驗。

2015年6月

（此文為《香港文學》雜誌2015年7月號卷首語，2015年。）